

毛泽东论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

车宗凯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在资政层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治党治国功能的认识,即中共党史服务党的理论创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服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在育人层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功能的认识,即中共党史的群众引导、干部教育、青年教育功能。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资源,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党史观的形成奠定基础,更为新时代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资政育人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001-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①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和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②。毛泽东有着宽广的历史视野与历史胸怀,是一位有着深刻现实关怀与战略思维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通常都是从中国革命、建设的问题出发,对于党自身的历史更是如此。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彰显了毛泽东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党自身的历史和经验的态度和方法。同时,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的历史思维,具体表现在毛泽东善于抓住“历史”和“环境”的影响因素来分析现实问题,他指出:“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③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思想不仅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毛泽东论中共党史的治党治国功能

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的认识,上升到治党治国的层面,就是通过研究和学习党的历史,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经验总结、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和执行提供丰厚滋养,为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提供坚强支撑。

(一) 服务党的理论创新的功能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党的理论,进而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创的。1926年毛泽东在关于巴黎公社的讲演中就曾结合中国的革命问题告诫大家“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④,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的革

收稿日期:2021-09-26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1LLZZA04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VXK02)

作者简介:车宗凯(1996—),男,福建三明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

①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②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命态度。大革命失败之初,毛泽东就曾有过“上山”^①的提议,但遭到否决。此后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毛泽东坚定地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都是毛泽东在总结党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总结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因为领导层存在主观主义错误导致革命遭到惨痛失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17年来党的斗争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命题。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②“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从理论上否定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为党的团结和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党史学习教育是延安时期党内整风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进了一大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④

第三,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在总结党自身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苏共二十大召开后,面对苏共二十大前后暴露出来的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1956年4月,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提出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正是因为“吃了大亏之后”实现了这种结合,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⑤。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回顾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他总结道:“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他提到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不同时期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关键就在于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要义,善于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从而将党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党的中国化创新理论,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二)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功能

中共党史不仅能够使人们看到经验和教训,更能在一些关键时刻使人们坚定信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时刻,毛泽东正是把握中共党史的这一特点,实现了党的思想统一、维护了党的团结。

第一,通过对历史规律的科学分析,坚定全党信心。毛泽东善于把握和分析历史规律,尤其是善于运用历史规律分析时代大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革命的“低潮”,毛泽东善于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国情特点出发,深刻分析“一国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①的现实可能性,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②毛泽东的分析和论证并不是自己的猜测和臆断,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尤其是面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于时局“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③的悲观声音,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系统论证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④的思考。同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面对国内“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毛泽东基于自己对革命历史经验的把握和分析,深刻指出妥协和轻敌两种倾向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进而提出“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⑤的重要观点,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客观、深刻、科学的,而非主观、浅薄、教条的,这也使得毛泽东对于党史、革命史的分析往往充满思辨性和现实性,能够极大地鼓舞人心、增强信心。

第二,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统一全党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善于运用经验的政党,建党之初的党史研究也正发源于部分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⑥。党的经验总结是革命、建设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党的经验总结有助于统一党的思想、明确党的方向。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必然艰难而曲折。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党曾走过不少弯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曾先后出现了多次“左”的和右的错误导致了革命实践的一次又一次失败,给党和革

命队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的同时,还指出“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⑦。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发起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其中,党的历史是延安整风时期党员干部的必学内容。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书”,为党的干部学习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供了重要参考。对此,胡乔木曾回忆:“当时中央并不是为了编印《六大以来》这么一本书,而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因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⑧事实证明,通过党内的党史学习教育,使党的历史问题得到充分、公开的探讨,党员干部对于党的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进一步在思想上达到统一。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尤其是路线斗争历史作出系统深刻的总结,统一了党的思想,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同样面对着许多未知的课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⑨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成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曾遇到的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善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⑩面对“大跃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

⑥建党之初,陈公博、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曾围绕党的历史经验写作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和《党史报告》等具有党史研究色彩的论著。其核心要义归结到一点,就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内思想统一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撑。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⑧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教训,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深刻总结,只有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①。1964年7月,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他同样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出发,深刻指出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光明前途:“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以党的历史经验昭示历史规律,进而在党内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形成统一的认识与行动。党的历史经验总结,虽然总结的是“过去”,但面向的却是“未来”,解决的是“现在”的实际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规律的分析,还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对于中共党史的这两种理解和认识都是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而这本身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出来的宝贵历史经验。

(三) 服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和执行的功能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这样说:“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③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善于从推动工作的角度出发,将党的历史经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层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党史的梳理,分析制定方针政策的党情国情。党情国情是一个兼具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的概念。毛泽东曾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④在毛泽东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当中对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看法和观点,都来自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党史的

观察和分析。例如,毛泽东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基本思路就是立足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提出的。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是“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应该分为两步,即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指的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⑤。毛泽东曾将苏东坡研究历史采用的“八面受敌”法化用为“四面受敌”法,形容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问题,即将中国社会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从而得出对于中国革命的结论^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基本上都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当前所处的现实背景出发的。例如,1957年毛泽东在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和敌我关系的发展变化基础上,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概念,认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⑦,并指出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起了指导性的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党史的认识为不同时期毛泽东思考党情国情提供了历史基础。

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实施层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党史的梳理,明确实施方针政策的经验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从制定出台到落地实践,需要经历一个判断、论证的过程。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在中央学习组上指出,要把事情“办得更好”,就必须把党的历史搞清楚、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①。这体现出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在《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批评部分党员产生的轻视历史经验的现象,他说,党的经验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②。其实,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身体力行地将宝贵的历史经验运用到方针政策的实施中去。例如,在系统阐发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时,毛泽东就回顾了中国共产党28年来的革命历程,深刻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明“五四宪法”的相关问题时,就从“总结了历史经验”的角度,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政发展历史,论证了“五四宪法”的进步意义^④。从方针政策的实施层面看,毛泽东通过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党史的回顾和总结,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论证、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

二 毛泽东论中共党史的宣传教育功能

与其他历史门类相比,中共党史因其涵盖历史时段的特殊性,对于现实具有更强的启示性,因而具有更强的育人功能,对党员干部、青年群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作用也更显著。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育人功能是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所在。

(一) 群众引导功能

毛泽东将中共党史的学习和教育看成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1944年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高度赞扬他写作的

《甲申三百年祭》,并指出:“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⑤在这里,毛泽东看出了史学研究背后的社会价值,看出了史学研究和教育对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1945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义时,就提到因为“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而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作了很好的评价与总结,有利于人民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决议“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⑥。显然,毛泽东看到党的历史经验总结的社会意义,即党的经验总结在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方面的影响。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重视党史的宣传教育,还十分重视史学研究问题,经常与历史学者交流探讨。例如,1939年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就表明,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并提出自己关于民族史研究问题的一些看法^⑦。1940年9月,毛泽东在给范文澜的信中赞扬了他讲演提纲中“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主张,并鼓励他:“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⑧毛泽东关注史学研究的态度与其重视党史研究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交流讨论的来往记录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历史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走向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愈发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问题,中共党史的宣传教育正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例如,1951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办法的通知》明确指出,应当“形成以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同时陆续在党的支部中和劳动群众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的宣传”,并要求党所领导的报刊陆续大量刊登与党史相关的文章^⑨。1959年,《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开展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农业业余学校的教育内容应对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作全面安排,其中“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讲解一些有关哲学、党史、政治经济学的常识”^①。

由于中共党史的特殊性,开展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的学术功底,还需要有过硬的政治素养,所以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需要一支专业性的工作团队。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党史研究的理论人才队伍建设。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这部分的讲话要点中这样记录:“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②在这份后来被载入《毛泽东文集》的讲话要点中,毛泽东及编者虽然没有对要点中的这段记录作出更加详尽的解释,但是,结合上下文可大致推测,毛泽东在这里提议的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的分工问题,显示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同年4月,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同意中宣部将年度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并提出:“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③正是有了这样一支从事党史研究的理论队伍,使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工作有了抓手和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理论人才的培养。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④,强调理论队伍建设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而党史研究队伍是理论队伍的重要组成。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事业蓬勃发展,一些从事党史研究的党政专门机构先后设立。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

的通知》就要求,在中宣部下设党史资料室,负责编印一种党内的不定期期刊《党史资料》,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⑤。同时,部分高校设立从事党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就设置了“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后来调整为“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从事相关教学研究工作^⑥。专业队伍的形成成为党史教育在全社会的铺开准备了条件,为党和国家的党史研究工作传统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党史研究作品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共党史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而《三十年》一文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写作完成的。1951年3月,胡乔木曾致信毛泽东:“近日宣传部忙于准备开会,写党史提纲(七一用)和整党读本,很多应作的事都没有作,希望多给指示。”^⑦他信中所提及的“党史提纲”正是后来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三十年》。事实上,在《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他曾与毛泽东就一些党史问题交换过意见,并留下了书信史料:1951年6月,胡乔木致信请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排好的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对于文中涉及陈独秀的评价、中共一大代表人数问题及相关文字表述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与答复^⑧。这些记录足见毛泽东对于党史写作编纂的关注,同时体现出他对党史宣传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视。

(二) 干部教育功能

党员干部既是党史的学习者,同时也是党史的参与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党就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党史学习教育,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教育已成为党的光荣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与锻炼,而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传统、经验、精神的学习就成为党员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⑥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

⑦《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⑧《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72页。

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①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为害相当大,不可等闲视之的”^②。因此,党的历史成为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期间党员干部的必学内容。围绕学习党的历史,毛泽东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明确要求:“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问题。例如,1961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④

同时,关于党员干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的学习运动期间,在多个场合阐述自己关于党员干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认识。例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大会上指出,党员干部不能只“通现在”,还要“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⑤。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古今”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治史方法。1942年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中共党史的“古今中外法”,并阐释指出:“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⑥毛泽东认为,研究党史的态度,必须是全面的、科学的而不是主观主义的,尤其是对党史上的错误要正确看待,“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⑦。同样,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

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分析和研究党的二十二年历史的方法问题时,批评了那种“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他指出,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⑧。从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学习方法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年间“鉴古知今”的治史态度以及唯物史观的历史思维贯穿在他看待党自身历史的态度当中。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⑨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之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围绕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教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例如,1939年2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训令》中就将中共党史同民族统一战线及新阶段、中国革命史及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概论、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党建、政工等内容一并列为学员学习的科目^⑩。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将干部学习的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时事政治、军事学习等课程类别。其中,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被列入初级课程内容,联共党史被列入中级课程内容,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被列入高级课程内容^⑪。由此可见,中共党史是干部学习教育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是足见党中央对干部党史教育的高度重视。同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也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等列入了各类干部的教育内容中^⑫。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轮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79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⑫《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中,将中共党史与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等内容列入马列学院的课程中^①。同样,在中级党校的课程中,也包括中共党史(包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内容^②。党史教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干部队伍培训教育的必修课程,也成为党内干部教育的重要传统,深刻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的历史思维和现实关怀。

(三) 青年教育功能

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党的光辉历史是学习党的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动教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青年群体的党史学习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围绕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几次政治运动纪念节点,面向青年群体强调了学习党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例如,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毛泽东在为《解放》写的纪念文章中系统梳理了五四运动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他在文章末尾指出,“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他希望青年能够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③。同年5月4日当天,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的纪念会上,结合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系统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并指出青年要懂得“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④,尤其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青年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⑤。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还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面对青年群体阐释了一二·九运动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意义,并强调了“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即知识分子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的重要性^⑥。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青年的要求与希望,是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释基础上得出的,目的是

为了让青年群体更清楚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增强青年群体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尤其是以近代史、革命史、党史为基础的分析对青年们来说更具有说服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将党的历史融入青年的教育之中。例如,在1957年3月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在谈到具体教学问题时,毛泽东说“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既要讲“猴子变人”,也要讲“阶级斗争”^⑦。在这里,毛泽东非常形象地指出了在青年层面开展历史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逐步融入了大中小学的课程教学中,并成为我国大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关键环节。1964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将中共党史作为“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之一,在课程内容中强调“以党的历史为线索,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使学生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同时,《做革命的接班人》《社会主义发展史》《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新编和修订的中等学校课本也投入使用^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回忆自己中学时学到的政治课本《做革命的接班人》,他认为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选择”^⑨。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亲历者的回忆深刻说明了这一时期青年群体党史教育的实际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于青年群体学习党的历史问题的强调,都是从服务党和国家的事业层面出发的,即通过系统的党史学习,增强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坚定决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0—601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191页。

⑨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三 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思想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对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实践都具有启发意义。因此,从思想史角度看待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既要看到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思想在毛泽东党建思想形成发展上的重要地位,看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观、党史观的塑造的重要价值。

(一)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资源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对于恩格斯的这句话,毛泽东深有体会。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惨痛教训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当只作为教条,而应该当成“革命的科学”,学习他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毛泽东得出的结论^②。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资源,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上,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体现在从资政育人角度对中共党史的经验性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实践层面的经验资源,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的原料与动力;二是体现在从资政育人角度对中共党史的历史性总结,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科学性的实践验证,从而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与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现和证明”的规律性认识。

(二)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党史观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2021年2月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这一重大命题^④,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待自身历史态度的深刻总结。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党史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确立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⑤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论述,都是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之“矢”射党的革命和建设历史之“的”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对待中共党史的态度,始终是“拿中国做中心”,“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⑥,这种方法深刻影响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看待党史、研究党史所采用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党史观的根本保证。二是形成客观总结正反历史经验的科学态度。党在革命时期所走过的弯路对于身处其中的毛泽东影响是巨大的。延安时期党内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及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党的正反历史经验总结方面探索出的创新路径,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史经验总结提供宝贵的思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改革开放后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邓小平指出:“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⑦显然,两份“历史决议”虽然时间、内容不同,但其中贯穿着的科学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三)为新时代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供启示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④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⑤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面临着全新机遇和挑战,中共党史依然是治党治国、宣传教育的教科书、资源库。如何学习和运用中共党史,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是新时代的新课题。新时代国内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要求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②;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求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③;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呼唤党的历史经验再总结、再认识,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大势,从中把握规律性认识,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思想,为新时代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启示。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重视在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体、社会各界推动党的历史教育,创造了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新时代经验,在继承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其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思想,为新时代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启示。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重视在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体、社会各界推动党的历史教育,创造了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新时代经验,在继承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其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Mao Zedong's Views on the Function of Supporting Governance and Educating People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CHE Zong-kai

(College Morality Research Center/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ought on the function of supporting governance and educating people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is mainly reflected in Mao Zedo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governing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CPC serves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afeguarding the unity of the Party, and serv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oth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major policies.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Mao Zedo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a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masses guidance, cadre education and youth education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Mao Zedong's thought on the function of supporting governance and educating people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has provided resources for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orrect view on the Party'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rovided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nction of supporting governance and educating people by the history of the CPC.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CPC;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function of supporting governance and educating people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②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8页。

③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④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